

# 守成国与崛起国的贸易摩擦

——基于中美和日美贸易摩擦的比较分析

刘 彬 明元鹏 陈伟光

**内容摘要:** 美国在不同时期分别对日本和中国挑起贸易摩擦,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更多是基于中日两国对其霸权地位的威胁。贸易逆差只是大国引起贸易摩擦的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之争,尤其体现为高科技领域上的竞争;同时,引起贸易摩擦也是守成国转移国内矛盾的重要方式。由于中日两国政治地位差异,与美国政治关系不同,本国市场纵深不同,中、日两国应对贸易摩擦时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而全球产业链的变化决定了两次贸易摩擦对世界经济的溢出效应也不同。面对贸易摩擦,我们要坚持深化改革,实现高水平开放,提高金融系统应对风险的能力,保证经济增长;充分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深化周边经贸合作,通过“一带一路”不断深化区域合作;在政治层面,中美双方应维护对话合作机制,保持政策弹性、扩大政策空间、增进两大国互信,共同建设更有包容性的国际秩序,超越争霸思维,减少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效应。

**关键词:** 贸易摩擦 守成国 崛起国

DOI:10.14114/j.cnki.itrade.20200306.004

## 一、引言

贸易是国家财富增长的动力,几乎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都确信,自由贸易能够促进资源在市场的有效配置,在总体利益增进上,自由贸易比贸易保护好。但是每一个国家出于本国政治、政治利益考量,都会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以保护本国经济,保障本国利益。从大国贸易竞争视角来看,一国的政策往往取决于其在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大国根据自身需求采取不同贸易政策。在崛起和鼎盛时期,国家往往主张自由贸易,通过竞争优势扩大自身利益,提高本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份额;而在相对衰落时期,更加重视国家间经贸往来中相对获益程度,通过实行贸易保护,保护自身利益,维护本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同时减少贸易对象国的相对收益。如英国在崛起时期,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

机器生产占主导地位,需要寻求市场的扩大,便废除了《谷物法》,减少贸易保护,推行自由贸易。19世纪末德国崛起,英德在全球范围展开争夺,贸易摩擦增加,英国结束了长达30年的自由贸易时期,最终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两大阵营的对立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提倡并主导贸易自由,而随着七八十年代欧、日的崛起,美国便相应地通过各种方式设置壁垒,政策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并通过发动日美经贸摩擦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

从2010年起,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经济总体规模已达美国的2/3,成为美国的第一大竞争对手。2017年12月,美国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渲染“中国威胁论”,强调中国企图挑战美国实力,侵蚀美

**[课题信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研究”(15ZDC038)和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滚动支持项目“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战略选择”(IRT\_17R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信息]** 刘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讲师;明元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陈伟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刘彬,电子邮箱:liubin1063@qq.com。

国国家安全。2018年美国国防部发布《国防战略报告》，对华基调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致，对华开始实行的“防范”“遏制”战略已成美国对华的指导思想，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已对其主导世界的地位构成挑战。2018年5月，美国以“公平贸易”为名发动中美贸易摩擦并不断升级，分别对中国出口的500亿美元、2000亿美元及3000亿美元商品分多次加征关税；2019年8月24日，特朗普宣布进一步对所有商品提高加征税率，将之前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从25%提高到30%，对另外3000亿美元产品关税税率从10%提高至15%；同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中国并未操纵汇率的情况下，美财政部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之列。面对美方的极限施压，中国也对美国进口产品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如暂停采购美国农产品、相应加征美国进口的760亿美元商品关税等，这意味着中美两国之间已经是全面性的贸易摩擦。综上，在美国的霸权思维下，中国是其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已对其主导世界的地位构成挑战。这一挑战促使美国发动全方位的中美贸易摩擦。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崛起，美国霸权将持续对中国施压；在美国主导的政治经济框架下，中美贸易摩擦也将会是一个深入持久的过程。

本文从崛起国与守成国竞争的视角，选取了日美贸易摩擦作为参照案例，通过比较分析中美和美日之间贸易摩擦的异同，一方面总结守成国和崛起国的贸易摩擦有哪些基本特征；另一方面探讨中国该如何从日美贸易摩擦中吸取经验教训，如何在保持自身发展的同时避免大国竞争的恶化升级，妥善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 二、日美、中美贸易摩擦的相似性

中国与日本都是在美国霸权治理下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实现经济的发展与超越。在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竞争关系的框架下，中美和日美贸易摩擦过程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日美和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背景和态势具有相似性。中、日两国都是在美国霸权的国际经济秩序中，通过利用自身要素资源、禀赋优势实现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

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政府制定各种贸易保护政策扩张出口、限制进口，如设置关税壁垒、进口数量限制、进口许可证和进口保证金等。通过对制造业的大量投资、充分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吸收国外技术，加速日本工业化进程，承接了大量从美国转移的产业，同时向美国大规模出口劳动密集、低附加值的产品，日本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则通过出口导向型战略，以生产补贴、出口退税、人民币贬值等方式实现低出口价格，支持出口。出口导向型战略成效显著，储备了大量外汇，也带动了经济和就业的增长，并长期执行推进。可以说，中、日两国都是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代工贸易发展而来，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承接了美国高科技和资本对外投资和产业升级的需要，通过对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创新，不断地在“干中学”，实现了对外贸易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并逐渐实现产业升级，先后成为“世界工厂”。从全球自由贸易发展过程来看，这是面对市场选择的结果。总体而言，良好的国家与市场关系、国家有效的产业政策，是中、日利用市场规律获得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在两次贸易摩擦中，美国限制中、日两国货物进口，并要求扩大美国产品出口，减少贸易赤字，具有相似性，但是使用的具体手段有差异。美国利用其制度霸权，采取了包括加征关税、限制进出口、反倾销调查、联合盟友施压等各种手段达成其目标。美国通过国内法，如301条款，对国外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同时对进口产品额外加征关税；在对日贸易摩擦中，还采取了最低限价制度、限制市场占有率上限、进口限制等措施。贸易摩擦后期，美国通过干预日本经济结构，从宏观经济制度层面改变日本，使得日本丧失国家自主性和自身经济结构优势，从而陷入长期“停滞”。而在对华相关贸易政策方面，除了以加征关税为主要手段外，还附带采取了多种限制措施，如通过重新签订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制定了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在高科技产业上，对中国高科技企业采取制裁、禁运、禁售等措施；同时，在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问题上，长期指责中国对美国存在“经济侵略”行为，如中国政府控制或干预美国企业在华运营，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目的是获得尖端技术和知识

产权等等；在全球范围内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手段，破坏甚至抛弃全球经济的多边规则框架，导致全球经济治理制度陷入瘫痪；同时，在贸易摩擦的谈判过程中，美国特朗普政府也是极限施压，出尔反尔，给贸易摩擦的解决增加了不确定性。

第三，日美、中美贸易摩擦都是以两国贸易失衡为表征，以此为发动贸易摩擦的理由，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转移美国国内矛盾，缓解国内社会问题。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市场发展的过程，美国对日本和中国的贸易逆差也是自由贸易条件下全球市场选择的结果。在两次贸易摩擦过程中，美日、中美之间贸易逆差同样并没有因为贸易摩擦而减少，在一定时期反而有所扩大。由此可见，美国贸易平衡的目标通过贸易摩擦的方式难以实现，因为无法平衡的逆差归根结底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自由贸易条件下分工不同造成的，是通过市场实现资源配置的结果，尤其是在美生产成本提高的后果，所以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不会减少，只会在不同贸易对象国之间流转。而事实上，美国通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获得了研发和销售等较大部分的利益。此外，从美元金融霸权来看，要支撑全球货币的主导地位，不得不保持资本账户的大量盈余，只能通过资本账户顺差来吸引海外资金，与此同时就会导致经常账户持续性逆差，贸易失衡不可避免，甚至是美国影响和控制全球经济的重要手段。所以说，贸易失衡只是贸易摩擦的表象，却不是根本动因。

但是，利用贸易失衡为说辞，将国内发展矛盾转嫁到其他国家是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处于滞胀时期，经济增长乏力，内生动力不足，科技进步发展处于瓶颈期，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加速了美元的贬值，以美元为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同样，近年来美国不平等加剧，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极化严重，社会撕裂和矛盾激化使美国政府有意识地将矛盾转移到国外，将国内社会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和其他国家的发展，这显然是一种“以邻为壑”的策略。特朗普政府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为名，发动全球贸易摩擦的目的也就在此。

第四，日美、中美贸易摩擦更深层的原因是中

日两国在全球价值链层面的提升，威胁到美国在价值链顶层的位置。根植于大国竞争的地位考量，中、日两国产业的迅速升级和科技水平提升，直接威胁到美国在科技层面的领导地位，促使美国通过贸易摩擦对中日两国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加以遏制。因此，两次贸易摩擦的核心集中体现在高科技产业层面的竞争，并逐渐向其他领域扩散。

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国家对不同产业竞争的敏感性不同。科技水平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战略贸易竞争的重要领域，高科技领域竞争也成为日美、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领域，故而美国对中、日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格外关注，实行更加严格的控制打压措施。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提出科技立国，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经过几十年努力，日本国内拥有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的所有部门，半导体、芯片、生物科学等方面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为此，在美日贸易摩擦中，美国在不同领域采取的政策措施也不同，追求相对收益的政策目标存在差异。马斯坦丹诺的研究显示：美国在卫星领域完全采取考虑相对收益的政策，实行贸易保护措施；而在飞机领域采取了部分，在电视机领域则没有采用。而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出口产品也是逐渐由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并推动了整个全球价值链重构。美方高度关注“中国制造2025”计划，将其视为对美国的重要威胁，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通过一切可能手段，占领高科技产业，取代外国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以便为中国公司主导国际市场做好准备，这将对美国的核心优势产生重大挑战。中美贸易摩擦从2018年6月开始，美方最早对中国进口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商品，就是集中于高科技产业，如生物医药、新材料、工业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高铁等产品。由此可见，高科技产业的重要性使得守成国从更加重视贸易绝对收益转向相对收益，越是高技术领域，战略贸易竞争程度越激烈，这也就决定了美国宁愿利用“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贸易摩擦方式去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都是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发展起来的，通过与世界市场接轨，调整和发挥自身经济结构和要素禀赋优势，协调政府和市

场的双重作用,实现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崛起,从而形成了崛起国与守成国贸易摩擦的基本态势。面对中日两国的崛起和自身社会矛盾的突出,美国采取了加收关税、限制进出口和利用国内法进行反倾销调查等方式发动贸易摩擦,并将重点集中于高科技领域进行限制和打压。这表明贸易摩擦是平衡其贸易逆差的手段,同时也转嫁了其国内矛盾,而从深层次上看,则是与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的重要表现。

### 三、中美、日美贸易摩擦的差异性

从崛起国和守成国战略竞争的视角看,我们需要从各个层面发现中美、美日贸易摩擦中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在这些差异中寻找有利条件,破解中美贸易摩擦困境,并吸取教训,避免陷入日本长期停滞的困局中。这些差异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政治层面看,中、日政治地位以及对美关系不同,决定了应对策略的不同。美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同盟关系,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决定了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所以,尽管当时美日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对两国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只属于西方世界的内部矛盾。无论面对苏联还是中国,日本始终还是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保护,故而在日美贸易摩擦中面对美国的频频发难,日本始终是以退让和妥协为主,满足美国的要求。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已经决定了美日贸易摩擦必将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

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发展使自身在国际上话语权逐渐增强。中美两国在政治理念、经济理念、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在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与美国具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同时,中国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相去甚远。总体而言,由于中美之间的差异性,中国的和平发展被视为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重大挑战。大国战略竞争决定了中国不会采取日本的退让策略,可以预见中美贸易摩擦将是长期的,且可能会不断升级。不过,需要警惕的是,有人将贸易摩擦和经济竞争上升到意识形态上,挑起人们对中美“冷战”的想象。所以,中美经贸摩擦关键问题在于中美两大国之间如何管控摩擦,保持对话和克制的态度,共同解决问题,警惕非理性对抗升级。

第二,从经济层面看,中国经济体量大、韧性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在政策上具有自主性,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较强。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体量巨大,拥有完整的制造业,是第一制造业大国,同时还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最大的单一国内市场,规模远大于日本。中日两国曾经都是“世界工厂”,日本主要贸易对象是美国及欧洲等发达国家,日本着力发展的行业与美国产品的竞争性强,如电子、汽车、半导体等行业,都直接冲击美国国内同类产品。而中国与美国之间曾在很长时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国,而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两年来,也仍然保持互为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由此可见,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较深,互补性较强,并不容易“脱钩”。同时,中国国内市场巨大,人民具有较高的储蓄率,这意味着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之间具有较大的转换空间和较强的韧性。此外,我国与全球100多个国家保持紧密的贸易往来,在全球货物贸易、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中的比重逐年增大,2013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逐步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美之间存在贸易摩擦,但是双方的经济往来还存在巨大空间。

第三,在应对贸易摩擦的方式上,中日两国呈现了巨大的不同。从日美贸易摩擦的过程看,日美贸易摩擦并没有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产生根本性影响。但是,美国在金融领域对日本进一步施压,通过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日元升值形成的财富效应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土地价格飙升、资本市场膨胀,实体经济扭曲、虚拟经济非理性发展,政府又未能及时进行结构性改革,造成金融危机、高失业率、通货紧缩、消费不足,经济泡沫破裂之后,日本步入“失去的十年”。虽然日本近十年的萧条不能完全归咎于《广场协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日元的大幅升值是日本泡沫经济的重要因素。美日贸易摩擦后期,美国试图改变日本经济结构,直接干预日本宏观经济政策,改变美日贸易失衡,贸易摩擦转向制度干涉,日美贸易摩擦升级为制度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步步退让,丧失了政策独立性,既有的经济结构优势不复存在。而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中方始终坚持以我国为主,坚持政策的自主性。从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在美方要求人民币升值压力下,中国政府根据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汇率市场化改革,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本次贸易摩擦过程中,实施对等反制措施的同时,始终坚持克制、理性态度,保持对话,推动自身的高质量开放与改革。需要注意的是,在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美方同样在制度层面对中国进行施压,一方面要保持政策的弹性,争取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和协议,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摩擦升级的持久战的准备。

第四,全球产业分工形式的变化决定了美日贸易摩擦溢出性较低,而中美贸易摩擦溢出性较高。全球产业分工在过去40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主要发生在六个行业,更多属于对日本进口的具体产品的限制。对日本而言,当时很多产品的生产主要是在一个国家独立的工业体系中完成。与美国产生贸易冲突后,部分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在减少日本进口的同时,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增多。所以说,日美贸易摩擦对市场的影响、对世界各国波及范围并不广。因此,日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冲击效应只存在于两国商品之间,不会影响到其他国家贸易,更不会影响到全球产业价值链造成破坏。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国际贸易分工从产品间分工发展到更多是产品内分工,这意味着中美贸易摩擦涉及全球价值链的断裂与重塑。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全球形成了一个生产网络。各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得到了充分应用,不同生产工序中的规模经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专业化分工下的经济利益也得到了极大提升,加速了实现世界资源的深度整合。中国已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主要承担加工贸易,是低端产业链和高端产业链之间重要的联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枢纽地位,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甚至阻断了全球价值链的正常运行。如果中美真正“脱钩”,则意味着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将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 四、结论与启示

从守成国与崛起国竞争视角看,美日和中美贸易摩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第一,以贸易失衡为由,在经贸领域发动摩擦是霸权国出于对自身霸权地位

维护的重要手段;第二,守成国利用其政治、经济的优势地位,通过其制度霸权实现国家利益,影响他国经济政治结构是重要的战略手段;第三,在相互依存条件下,守成国对不同领域的贸易摩擦敏感性不同,对高科技领域最为敏感,政策上相对收益倾向最明显,故而美国发动对中、日的贸易摩擦,首先重点针对高科技领域;第四,守成国通过贸易摩擦方式打压崛起国,转嫁国内矛盾,是其实现国内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方式。

而与日美贸易摩擦相比,中美贸易摩擦仍然有其独特性:一是中美两国都是政治大国,战略竞争态势更加明显,尤其是对高科技领域的争夺,将可能持续更长的时期;二是中美之间贸易互补性较强,存在更深度的相互依赖,在全球价值链中美贸易摩擦溢出性较强,影响全球经济;三是中国市场更加深广,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四是面对极限施压,通过对等加征关税加以报复反制是必要的手段,应以日本为鉴,防范美方将贸易摩擦升级、蔓延。从长期来看,需要用更宏观、更长远的眼光审视全球局势变化,坚持独立自主、保持战略定力,同时也要用更有弹性的、柔性的外交手段,保持战略对话,增进互信,维护战略大局稳定。

第一,需要不断推进对内改革,实现高水平开放,确保我国经济、政治、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二是促进高水平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对标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放宽市场准入,改善投资环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三是提高创新能力,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深度融合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不断推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高端化的跨越发展;四是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完善基础性制度,结合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行为监督,更加规范资本市场的运作,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金融环境,加强监管国内金融系统的薄弱领域,警惕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

第二,不断开拓周边和区域合作,进一步扩大市场。我国应大力开拓对外经贸合作空间,分散对美国的依赖风险。一是需要维持与周边国家健康稳

定的经贸关系, 加快推动与日本、韩国, 包括南亚、中亚等地区的深度合作, 建立自由贸易区, 扩大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 积极营造有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二是依托“一带一路”倡议, 聚焦互联互通, 实现要素自由流动, 优化对外经济结构, 加强与沿线及周边国家的产能合作, 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 促进投资与产能转化。通过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区域合作机制, 为全球发展提供公共品, 提高区域合作水平。

第三, 保持中美双方对话合作机制, 拓宽沟通渠道、增强两国互信、扩大政策空间, 在现有国际秩序下促进改革, 使现有秩序具有更大包容性。中美两国“合则两利, 斗则两伤”, 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发展和世界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 要突破现有僵局, 中美经贸关系应回归贸易本身, 美国应该重新审视对华贸易政策的合理性, 集中于国内发展问题, 认识到中美贸易对两国的重要性; 同时放弃通过贸易摩擦等方式改变中国经济结构, 干预中国政策独立性的幻想。中国也需要以更加开放务实的态度, 扩大谈判的政策空间, 推动自身的高水平开放。

在现有国际秩序中, 中美两国双边关系对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现行国际社会以制度治理为基本准则的基础上, 需要超越以往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争霸逻辑, 寻求更广泛的空间, 承认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同时, 摒弃意识形态偏见, 平等交流, 增进大国互信, 促进国际秩序更有包容性的改革, 实现新的权力平衡。这是避免贸易摩擦升级, 防止破坏全球秩序稳定, 维护全球经济稳健发展的可行方式。

### 参考文献

- [1] 包善良. 中美贸易争端的演进过程、动因及发展趋势 [J]. 国际关系研究, 2018 (04): 56-76.
- [2] 桑德斯. 我们的革命: 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危机 [M]. 钟舒婷, 周紫君, 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 [3] 罗德里克. 贸易的真相——如何构建理性的世界经济 [M]. 卓贤,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 [4] 高程. 中美竞争与“一带一路”阶段属性和目标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 (04): 58-78.
- [5] 国家统计局: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 GDP 增长 33.5 倍, 年均增长 9.5% [R/OL]. (2018-08-27) [2019-06-26].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8-08-27/doc-ihifu\\_vph9590158.shtml](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8-08-27/doc-ihifu_vph9590158.shtml).
- [6] 国家统计局: 内需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达到 105.7% [R/OL]. (2018-04-11) [2019-06-26]. [https://finance.ifeng.com/a/20180411/16073811\\_0.shtml](https://finance.ifeng.com/a/20180411/16073811_0.shtml).
- [7] 郭晴, 陈伟光.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战略选择的探讨 [J]. 国际经贸探索, 2018 (3): 4-11.
- [8] 韩永辉, 罗晓斐. 中国与中亚区域贸易合作治理研究——兼论“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建自贸区的可行性 [J]. 国际经贸探索, 2017 (2): 72-84.
- [9] 戈莫里, 鲍莫尔. 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 [M]. 文爽, 乔羽,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 [10] 李春顶, 何传添, 林创伟. 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政策的效果评估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367 (10): 139-157.
- [11] 吉尔平.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M]. 杨宇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12] 古德曼, 朱子阳. 美日关系: 伪密友与真同盟 [J]. 国际经济评论, 2016 (03): 172-173.
- [13] 马斯坦丹诺. 相对获益重要吗? ——美国对日本工业政策的反应 [M] // 鲍德温.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肖欢容,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 [14] 倪红福, 龚六堂, 夏杰长. 生产分割的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生产阶段数的考察 [J]. 管理世界, 2016 (04): 10-23.
- [15] 斯佩罗, 哈特. 国际经济政治学 [M]. 吴义学,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16] 宋泓.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贸易及相关政策的影响和变化 [J]. 国际经济评论, 2017 (01): 102-117.
- [17] 苏长河. 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 (07): 15-20.
- [18] 王燕, 陈伟光. 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转型 [J]. 学术界, 2018 (04): 161-172.
- [19] 王跃生, 马相东, 杨丽花. 中美、日美贸易摩擦原因的比较分析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8 (05): 34-38.
- [20] 吴心伯. 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转型 [J]. 国际问题研究, 2019 (3): 7-20.
- [21] 肖志敏, 冯晟昊. 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影响分析——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 [J]. 国际经贸探索, 2019 (1): 55-69.
- [22] 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 II: 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的巩固 1600—1750 [M]. 郭方, 吴必康,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 [23] 张宇燕, 冯维江. 从“接触”到“规锁”: 美国对华

- 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 [J]. 清华金融评论, 2018 (07): 24-25.
- [24] 赵谨. 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演变及其在经济全球化下的特点 [J]. 世界经济, 2002 (02): 50-57.
- [25] 周立. 中美贸易争端: 技术封锁与保护主义 [J]. 国际经贸探索, 2018 (10): 88-104.
- [26] 周政宁, 史欣璐. 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的影响: 基于动态 GTAP 模型的分析 [J]. 国际经贸探索, 2019 (02): 20-30.
- [27] 朱民. 世界经济: 结构性持续低迷 [J]. 国际经济评论, 2017 (01): 9-22.
- [28] BARBIERI K.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96, 33(1): 29-49.
- [29] GARTDKE E, LI Q, BOEHMER C. Investing in the peac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1, 55(2): 391-438.
- [30] GILPIN R. Three models of the future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75, 29(1): 37-60.
- [31] KAPSTEIN E B, MASTANDUNO M.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32] LANGDON F. Japan-United state trade friction: the reciprocity issue [J]. Asian survey, 1983, 21(5): 653-666.
- [33]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R/OL]. (2018-03-22) [2019-06-26].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Section%20301%20FINAL.pdf>.
- [34] POLACHEK S W. Conflict and trade [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80, 24(1): 55-78.
- [35] STIGLITZ J E, CHARLTON A. Fair tread for all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36] USTR.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R/OL]. (2017-12-18) [2019-06-2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 [37] White House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R/OL]. (2018-06-19) [2019-06-2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8/06/FINAL-China-Technology-Report-6.18.18-PDF.pdf>.

##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Established Power and Rising Powers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ino-US and Japan-US Trade Frictions

LIU Bin MING Yuanpeng CHEN Weigu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initiated trade frictions and implemented trade protectionism against Japan and China in different periods for the threat of the hegemonic status. The trade deficit is only the superficial cause of trade frictions, and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the established and rising powers is the underlying cause,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high-tech competition. Meanwhile, the initiation of trade frictions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for established powers to transfer domestic contradiction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of political status, political rel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rket size, China and Japan have adopted different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trade frictions;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two trade frictions on the world economy are also different for the changes in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In the face of trade frictions, we must persist in deepening reform, achieve high-level opening-up,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to deal with risks, ensure economic growth, make full use of the vast domestic market, deepen regional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t the political level,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keep the mechanism of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working, maintain policy flexibility, expand policy space and enhance mutual trust,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more inclusive international order beyond zero-sum thinking and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rade friction.

**Keywords:** trade friction; established power; rising power

**JEL Classification:** F19, F50, F51

(责任编辑: 李秀婷)